



〔西 德〕

维利·勃兰特 著

会见与思考

说 明

本书是西德前总理维利·勃兰特的一本回忆录，记叙了他任西柏林市市长、西德外长、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联邦总理期间所经历的政治和外交活动。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张连根、王昭仁、吴增华、林荣远、潘建心、吴衡康、张伯幼、李三齐、程慧中同志；全书由张连根同志校阅。

Willy Brandt
Begegnungen und Einsichten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6

会见与思考

〔西德〕维利·勃兰特 著
张连根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0 印张 476 千字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 197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300 册
统一书号: 3017·250 定价: 1.85 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墙	3
第二章 阿登纳时代的结束	35
第三章 约翰·肯尼迪	64
第四章 小小步骤	94
第五章 和戴高乐的谈话	123
第六章 大联合	154
第七章 联邦外交部长	175
第八章 东方政策	208
第九章 1968 年	249
第十章 在绍姆堡宫	282
第十一章 欧洲的联合	307
第十二章 华盛顿	363
第十三章 莫斯科	416
第十四章 埃尔富特,卡塞尔和柏林	469
第十五章 华沙和其他里程碑	511
第十六章 趋向的转折?	547
第十七章 危机和机会	574
第十八章 展望	621

前 言

1974 年春，我辞去联邦总理的职务，其后有人问我，是否到了我该整理回忆录的时候了。我出任过柏林市市长，出任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和政府首脑——还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政治上负过责任，所以我认为，对我任职的年代作一初步总结是很有意义的。

有些问题，一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然而这些问题却又决定着一个国家人民的命运，我在写本书时，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到追述当时与这类问题有关的思想 and 行动上。本书可能会助长这样一种偏见，似乎我过分关心外交政策，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我还是认为对待重要的事情，应该郑重其事。

政策可能缓慢地引起变化，也可能急剧地引起变化。无论哪种情况，外界环境总要对当事者的思想发生影响，因此，回顾一下以往的会见与思考，有时可以反映各阶段事态的发展以及当事人和旁观者的看法。我想，政治的盘根错节和千变万化会由此一目了然。同时，读者将了解到，有些事情——特别是我本人的态度——一如往昔，没有变化。

读者会清楚，除了靠自己的记忆之外，有些部分我也凭借文字记录。我必须注意不损害我国的利益，也不影响为某些意义深远的行动而采取的客观的合作政策。这就是说，我既作了真实的叙述，又不泄露机密。

今后几年将出版第二卷，主要叙述我从青年时代以来所积累

的经验。特别是我在社会民主党营垒中所总结的经验。写了这些记述,我不会就此而罢手。我希望能够继续作出贡献,去完成始终切切在心的任务: 和平合作以及把自由与正义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

维利·勃兰特

1976年4月于波恩

第一章 墙

1961年8月13日下令筑“墙”的那一天，正是炎夏的一个星期天。许多不能到外地去度假的市民，乐于逍遥自在地到城郊湖边去游泳，也许乐意读上几小时书。凌晨的新闻使他们大为吃惊：柏林两部分彼此的通道被封锁了。8月13日成了惊惶、恐惧、迷惑不解的一天。

这一事变迫使我去考虑一些国际因素，在今后的岁月里，德国的政治，欧洲的政治也许将取决于这些国际因素。

物质含义上的墙，三天后在武装人员督监下建立起来了。城市遭到封锁的消息传到我那里时，我正睡在卧铺车厢里，从纽伦堡到基尔去。一天以前，我在纽伦堡我党的一次大会上作了发言。星期日，我本打算在基尔真正开始竞选活动。距联邦议院选举还有整整五个星期。我在政界的朋友们提名我为总理候选人。

凌晨，一位铁路官员敲我的包厢门，告诉我说，东区已开始截然封锁，请我尽快返回我的城市。我和一小群随行人员于五点左右在汉诺威下车，搭清晨首次班机向柏林飞去。我从滕佩霍夫机场立即驱车向边界驰去，先到波茨坦广场，然后又折向勃兰登堡门。我目睹几小时前才运到那里的障碍物，看到那里的人们以德国人所特有的彻底性正在设置障碍。街上竖起了水泥桩，架上了铁丝网。我看到了一部分军队，他们不是俄国人，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投入的大批军队，他们在执行封锁通道的命令。我看到身穿军服正在那边值勤的同胞的空虚渺茫的眼神，特别是我的西柏

林市民的忧虑绝望的目光。

我跟每一个处在紧急情况下的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人一样，感到对事变不能束手无策、袖手旁观，而应该采取行动。我感到难于平心静气、镇定自若了。我们在过去几次柏林危机时，都不得不保持冷静头脑，并且对外不得不表示出我们具有这种冷静头脑。这次是 1948 年封锁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虽然还不是直接的军事威胁，因为情况并不象当年那样，用暴力把我们与外界隔开，而是一个政权为着反对我们把自己及它的人民封锁起来。尽管如此，疯狂地进行着的封锁工作，边界上剑拔弩张的警戒部队，呈现出一幅威胁的景象。按照我们对关于这个城市的四国共管协定的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军人无权进入东柏林的领土，难道就应该眼巴巴地看着有关德国并为德国而制定的法规遭到践踏而心安理得吗？难道应该容忍加于我们的同胞——加于东柏林和东区的人民的这种凌辱吗？盟军对这里开始的事变会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吗？难道又要我们，如同这个星期日上午不止一个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满足于提出软弱无力的抗议吗？

我在市政厅主持召开了一次参议院——我们的市政府是按汉撒传统这样称呼的——特别会议。我们虽然只占半个城市，但根据德国宪法它却是一个完整的州。将近中午，我驱车去盟军司令部大楼，这是我在出任市长的岁月里破天荒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平时，我和西方司令经常会晤，但总是在他们的官邸，在我的市政厅，或在私人场合见面。我在司令部首先出乎意外地看到苏军将领柯蒂科夫的相片，他是苏联最后一个城防司令，十三四年前，他接到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离开了这个职位。盟军把他的照片仍然排在那个位置上，这决不是出于对他的敬意，而是过分拘泥地尊重这里仍然有效的四国共管城市协定。桌旁还为其实并不存在的后任留了一个空位子。

8月13日那天，三个西方盟国——我们柏林人称它们为保护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苏联人已经把东柏林各主要领域的支配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后者已让自己军队入城，并单方面支配城内交通工具以及决定人员来往。人们惯于任意地称西柏林人的特点在于“爱好和平”，柏林人在十天之内还可以通过边界；然后将毫不留情地中断柏林市民过境往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3年底签订通行证协定为止。西德人则另外对待，只要他们支付规定的费用，他们来访不受阻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政部长发布的指令涉及盟军本身。原则上不拒绝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去东城。挑衅还不至于严重到这个地步。但是却给他们规定了一定的通道。几天之后，只给他们剩下弗里德里希大街一个通道口。这一道口以“查理检查站”闻名于世。西方各国对“东德”居然唯命是从，这才是真正的、戏剧性的新鲜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强大的美国居然会让另一大国的所谓“卫星国”对自己发号施令。

8月13日那天，各盟军司令以及他们来自外交部身穿便服的副手，同我们（他们在柏林的伙伴）一样迷惑不解和晕头转向。他们倾听我们叙述，但那天正是星期日，他们从自己国家的首都得不到指示，因而无法对卡尔斯霍斯特^①的苏军司令提出抗议。我察觉到美国朋友愁容满面，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紧急通知了五角大楼、国务院、白宫。他们接到指示说，绝对不准发生无法控制的反应。一位美国参议员说，一般看来，西柏林没受到直接威胁，苏联人只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德国统治区域的秩序。他们虽然采用残暴手段，但是他们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制止无穷无尽向外逃亡的人流，这种外流有使“东区”的经济和知识界枯竭的危险。

^① 卡尔斯霍斯特，驻柏林苏军司令部所在地。——译者

当然，司令们并不掩饰自己对我们市民的同情；他们已经和“他们的”柏林人水乳交融，合为一体了。这个城市遇到的问题也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被着重告之不要造成“麻烦”。他们接到严格指示，绝对不能擅自行动。只有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协商后，才能采取行动。在这方面，倘是说谈到波恩，那也只是附带提一笔而已。

美国总统正在他的游艇上。人们大概不会不及时让他从星期日的宁静中惊醒过来。但他当时所最关心的，看来是盟军在西柏林的直接权利是否受到损害，而情况还不至于严重到这个地步，但是就整个柏林来说，盟军的权利却几乎已被轻蔑地撇在一边了。

后来，我们从肯尼迪幕僚写的回忆录中读到，当时使总统最伤脑筋的是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和可能面临一次核危机；因为柏林，一场毁灭文明的战争看来已迫在眉睫。“这一年夏季，他几乎没有考虑过其它事情”（小阿瑟·施莱辛格）。8月初，总统对他的一个助手说，为了重新控制局势，赫鲁晓夫一定会（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耍花招。他又说：“如果他（赫鲁晓夫）对西柏林搞什么名堂，我就可以促使盟国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他只对东柏林变花样，我就不能这样做了。”因为尚有几条道口依然畅通无阻，华盛顿在8月的那个黑暗的星期天，更多的是猜想：苏联及其东德盟友并不打算完全切断向外逃亡的人流，而只想控制这种外流。回顾起来，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错误估计。一位见证人说，这“构不成向东区进军、从而挑起反击而冒战争风险的理由”。

8月13日上午，盟军司令部召开会议，我在会上也提不出真正的反击措施。但是，我说：“你们至少应该在莫斯科和其他华沙条约国的首都提出抗议。”那时，一个为封锁进行辩护的声明刚以华沙条约组织的名义发表。（星期日上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报道说，封锁东柏林是符合几天前华沙条约组织各国政府一

致作出的决议的；但这种“福祉”并不能说明行动是无可争辩的。）我还说，“你们至少应该立即向边界上派出巡逻队以稳定人心，并向西柏林人表示他们并不遭受到威胁。”

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小时，请求派遣的军事巡逻队才在市内的边界上出现。

四十小时之后，才向苏联驻军司令提出法律上的抗议。

过了七十二小时，才用并不超过常规的措辞向莫斯科提出抗议。

8月13日晚，我们东柏林众议院召开特别会议。我的任务是表达市民的愤慨，而同时又要约束这种愤慨，告诫人们要保持冷静和理智。我承担这种义务，既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去完成这样的义务，对我说来不总是轻而易举的。在我出任市长期间，差不多还是第一次这样痛苦地体会到，什么叫无可奈何的愤怒。跟“那边”隔绝了，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遥远的政治问题：它同数百万人息息相关。有多少联系从此被粗暴地切断了——彼此相爱、相互需要、相互依靠的人们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我自己就有多少相识的朋友和社会民主党的同志在那一边啊！他们勇敢而坚韧（因为我党在东柏林没有遭到禁止，而是象影子似地合法活动着——这和在东区不同，1946年在东区到处强制实行把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一个统一党）。从那时封锁到这次筑墙的那些岁月里，我不常去东柏林。但有时也到那里去探望我在政界的一些朋友，而且他们也可以经常到西柏林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不禁自问：柏林人怎能忍受得了这种精神上的打击和刺激？我们曾经一再向他们保证（我们确信如此），我们不会让人家把我们的通道堵住的，而如今通道被堵上了，我们却无可奈何。当时许多人和我一样痛苦地醒悟，将柏林留为德国首都的要求动摇了。事实上，这种醒悟不仅使我自己，而且也使其他人在认识上开始一个

根本的转折，迫使我们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人民（和分裂的欧洲）命运作新的考虑。

8月13日那天，我跟波恩当局的接触仅仅限于同联邦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勃伦塔诺的一次通话。他认为，我们应该紧密合作。他就讲了这些。阿登纳则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后来，华盛顿的一位观察家在他的笔记里写道，双重恐惧笼罩着波恩：既害怕美国人软弱，又害怕他们死硬不化。

1961年8月13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晴天霹雳。当时，尤其后来，就有人问道：盟军知道了什么？事先有人得到过风声没有？偶而也有人猜测，我一定是得到了某种早期警报。要不然我前几天发表的公开言论又该作如何解释呢？8月11日，在去纽伦堡前一天，我在波恩拜访了联邦外交部长，提醒他存在着肆无忌惮实行封锁的危险：估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局纯粹出于保存自身的本能，会力图让它的苏联上级同意采取强硬措施。8月12日下午，我在纽伦堡广场介绍了急剧上升的难民数字——二十四小时内的逃亡人数，首次达到二千五百人，并强调指出局势的严重性。我补充说，大家知道我这个人不善于发假警报。原话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东区的同胞害怕他们的出路可能被切断，他们可能陷入孤独无援的境地并遭到封锁。”

我要是真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肯定不会睡在去基尔的快车里，而是立即飞回柏林。我看到了事情发展的趋势，但不知道事变发生的时间和具体形式。我比那些置身局外的人更加直接地感到事态变化的严重性。换句话说，我后来责备自己，我不该用下面这样的想法来宽慰自己：当时还不能绝对肯定，何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无法判断当时是否可以从情报机构提供的情况中得出现实

主义的结论。德国的情报机构，或是盟军的情报机构都没有给我打过招呼。把封锁的准备工作伪装得滴水不漏，看来是真正成功了。联邦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和法国情报机构——西方全部情报机构看来都受了蒙蔽。这是一件至今仍然值得注意的事。西柏林被视作货真价实的情报中心，事实大概也确实如此。这当然并不排除有关细节会在这些机构中被遗漏掉，因为，下面我们还将读到，政治和军事总部作好了对付另一种危机的准备。

有些人也可能把在柏林真正发生的事当作较小的灾祸。但是，事情向我表露，情报机构的明显无能与瓦尔特·乌布里希 6 月 15 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目张胆的暗示：“没有人想要筑墙……”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人们私下议论纷纷说，西方大国通过它们的军事代表团，已从波茨坦苏联最高司令部得到消息说：即将采取一些措施，但当然不会触及盟军的利益。对这点，虽然后来辟了谣，但辟谣所采取的那种形式并不能使人疑团尽释。

同时传说，7 月底，当约翰·麦克洛伊——最初几年驻联邦共和国的美国高级专员——在黑海边的索契代表美国总统和尼基塔·赫鲁晓夫谈判裁军问题时，就曾得到过暗示。几个月后，我和麦克洛伊谈及此事；为了消除我的任何怀疑，他千方百计向我担保：他没有得到过这类暗示。他说，赫鲁晓夫在对肯尼迪的一次讲话所作的反应是对他表示一般性威胁，这种威胁更多的暗示准备实行战争对峙。

盟国在战战兢兢地准备对付一次虚假的危机，这个简单明了的结论看来比情报机构效率问题更显重要。这点也适用于德意志联邦政府。更明确地说：我们柏林人感到残酷的事变，可能对其他人简直是一种定心丸。苏联一再威胁要单独缔结和约，但并没有签订，对盟军驻防没有提出异议，主要的是不象会发生战争，而初夏时情况却还是另一个样子。

5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他的总统报告说：一旦发生军事对抗，眼前的计划就意味着几乎直接过渡到核战争。肯尼迪认为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把自己限制起来的极端危险的做法。所以当他7月初在海恩尼斯港同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商谈时，命令制定一项非核抵抗计划。

在这次商谈之前，专家们已向美国总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计划方案；基辛格教授也是当时参加人之一。他们被责成制定一项政治计划，结果仅仅是于8月初在巴黎召开一次西方外长会议，但这次会议毫无结果。此后，有些人问道，要是当时按伦敦的建议——在波恩不反对的情况下，邀请苏联人参加四国会议，不是很明智的做法吗？

当一切过去以后，评论家便轻易地把惊心动魄的筑墙事件合理地纳入当代历史进程之中，并且把它看成是早就开始的发展的必然结果：看成是战胜国对在战争结束时所作的利益划分的一种肯定，看成是东西方之间行政上相互分离过程的结束（在柏林这种分离早在1948年就大体完成了），看成是在德意志土地上出现两个国家的必然结果。

但在当时，在8月13日那天，要求对令人发指的事变袖手旁观，并冷静地把它看作是世界事变的一环，这就未免过高了。一座具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机体被肢解了，成千上万个家庭联系被割断了。对此，除了愤怒和绝望以外，难道还能有其他反应吗？在德国的另一部分，我们的同胞清楚地知道，他们失掉了拯救他们的避风港；过去通过西柏林外逃并不十分困难。在我们的城市里，有时能跟来自西方的亲戚朋友会面，这对许多人说来更为重要。

这次精神上的打击也震动了德意志西部。尽管波恩明显地陷于瘫痪状态，人们还是在考虑：这次巨大的柏林危机将如何了结？这是1948年封锁和1958年赫鲁晓夫最后通牒之后的第三次危

机。盟军会继续全力支持西柏林吗？他们会使四国——三个西方大国和苏联——对整个德国所负的责任继续无可争辩地保持下去吗？德国边境以外的人也忧心忡忡地问道，是否会产生引起世界大国公开冲突的并发症？

当时不存在这种危险，但在 8 月 13 日那天，这点并不完全清楚。人们总是到后来才确实了解到这种情况。城市在市民的意识中一直是一个整体，对一个被分裂的城市的市长来说，几乎没有比 8 月 13 日发生的事件更为严重了，这一事件带来了无法用统计数字表达的种种人间悲剧。我作为对欧洲负有责任的德国政治家，除了考虑这种赤裸裸的非法行为之外，还得考虑这一深刻变化的意义。

我后来指出，他们在 1961 年 8 月拉开幕布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一个空荡荡的舞台。也可以更泼辣地说：我们失去了在希望破灭后仍然存在着的幻想，这些幻想是建立在某种东西的基础上的，而这种东西实际上也不再存在了。允许乌布利希往头号西方大国的大腿上恶狠狠地踢上一脚，而美国只是沮丧地把脸拉得长长的。这一天的经验对我以后岁月中政治考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被称之为我的东方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我不是指谅解的意愿——当我们在冷战期间不得不进行自卫的时候，我也不缺乏这种意愿；正是在充满“战斗”的岁月里，我也总是把保障和平视为柏林应起的作用。我被迫接受了新的见解：西方政策中已经成为传统的公式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和现实格格不入的。

肯尼迪总统上任后几周，1961 年 3 月中旬，我在华盛顿和他进行一次会谈，最后通牒所引起的危机阴影笼罩着会谈：我清楚地记得总统怎样从国务院准备好的公报文稿中划去长长一个段落，并代之以一句简单明了的话：美国恪守条约和信念所规定的义务。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语言的精辟扼要。（我回国后曾建议德国各

党派共同声明,如果在竞选过程中出现一次新的柏林危机,它们将采取相互支援的态度,但该建议未被理睬。)

公牛一般的克里姆林宫首脑尼基塔·S·赫鲁晓夫和年轻的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 1961 年 6 月初在维也纳会晤。苏联首脑表示决心在那年年底以前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缔结和约,并且(这早就成了老生常谈)赋予西柏林“自由城市”的地位。这意味着不仅要结束四国对全德担负的责任,并且宣布取消盟军在柏林的权利。(虽然以后,赫鲁晓夫又谨慎地补充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可以让西方军队留在那里。)他的威胁强烈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说,如果美国要打仗,那是它的事。肯尼迪临别时对他的谈判对手说,将会出现一个“寒冬”。在激烈的争论中,他让对方知道,他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他当美国总统不是为了让他的国家遭受孤立。美国进入柏林是打仗打出来的,它继续留在这个城市是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如果美国被别人从柏林“驱逐出境”,那么它的保证和义务就将被视作一纸空文。放弃西柏林等于放弃西欧,而西欧则是美国安全必不可少的。估计肯尼迪在维也纳没有谈到东柏林问题。回到华盛顿后,他向全国汇报说:“关于德国和柏林,我们进行了最黯淡无光的谈判。”同时,他指出,美国人对改变目前形势不感兴趣。西方国家不会放弃它们对西柏林市民应尽的义务。

为有些人始终所忽视的事,在这里就一清二楚了:美国人谈到柏林,指的是西柏林、盟军权利和对我们的保护。1961 年 4 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奥斯陆会议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驻扎军队;自由往来;城市能够生存下去。我们对这些提法并不感到十分满意:自由往来的权利单纯涉及盟军,还是最终对我们德国人——自封锁结束以来在遭到百般阻挠和刁难之后——也能成为现实?盟军是否已清楚看到,城市只有同西德的经济结构,同联邦共和国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保障西柏林继续生存下去？还有，这三项“基本要求”是否意味着，苏联人在东柏林，以及对东柏林可以为所欲为呢？

我的朋友们和我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一味安于维护现状，其结果是否会每况愈下，即连现状都保不住呢？我提出，是否可以考虑把题目加以扩大，同时加以改变呢？一旦有关的保证具备了，为什么不能就整个柏林作为一个自由城市的地位进行谈判呢？我说，据我所知，最近几年苏联方面曾考虑过这样一条出路——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也向我指出过这一点，但它遭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的激烈反对。7月初，我通过柏林驻波恩全权代表——我的朋友京特·克莱因博士——询问联邦政府，为了摆脱日趋狭窄的题目，是否可以向苏联政府提出重新统一柏林的建议。我们的建议没有落在肥沃的土地上。波恩答复说，我们必须坚持现状，提新建议要十分慎重。

这说得多么轻巧，免得劳心伤神。8月初，当我想对巴黎西方外长会议施加影响时，我又一次明白了这点。柏林驻波恩代表处的一位官员奉命向会议询问，打算对令人担心的东柏林封锁作何反应。可是他提的问题在德国代表团那里就通不过，代表团告诉他，不要让盟国离开原来的议题。这项议题就是对方威胁要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缔结和约。据说单独缔约就会造成我们为柏林所担心的那种后果。这是我所说的西方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付一个虚假危机上的又一个依据。

1961年夏天，我——并非初次——又公开提出，是否有许多迹象表明应该接受苏联关于召开一次和平会议的建议，而不是由西方中断围绕德国问题的争论，或听其自然。我是这样考虑的：应该抓住赫鲁晓夫的话，应该把他的要求同曾对希特勒德国作过战的各国所代表的意见进行对照。